

“‘送瘟神’的有力助手”^[1]:新中国“十七年”血防电影考察

○ 黄勇军 柳谦

摘要:“血吸虫病防治电影”是指建国后为配合血吸虫病防治运动而出现的一种主要面向疫区群众传播血防知识或以血防运动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特殊电影类型。“十七年”时期在政府、人民群众以及电影工作者等的密切协作下,“血防电影”通过独特的发行放映机制以及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血防运动并最终取得胜利。深入考察血防电影,不仅可以发掘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知识传播、宣传教育、思想动员等特殊价值与重要作用,还有助于对新中国电影史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新中国 “十七年” 血吸虫病防治运动 血吸虫病防治电影 创作生产 放映宣传

作为一种在地球上广泛存在、人类与之抗争数千年的地方性传染病——血吸虫病在我国一直长久肆虐,尤其是解放前夕,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破坏、经济衰败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血吸虫病疫情急剧恶化,甚至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步”^[2]。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主要流行于长江流域12省市的350余县市,患者近千万,受影响人口达一亿以上,是当时流行时间最长、传播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大的寄生虫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认为血吸虫病“关系到民族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而“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把血吸虫病消灭掉”。^[3]因此,消灭血吸虫病被作为当时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来抓。^[4]但建国之初的卫生防疫条件十分落后,且无专门针对血吸虫病的特效药,而血吸虫病的主要特点又是感染容易蔓延快,以“预防为主”就成为消灭血吸虫病的核心指导思想。这也决定了消

灭血吸虫病是“一种群众性的工作,必须发动与组织流行地区的劳动人民(主要农民)积极参加这一运动才能收到效果”^[5]。由此,新中国第一场大规模疫情防控战——“血吸虫病防治运动”^[6]于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府的领导与组织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时很多群众对防治血吸虫病并不理解,对血吸虫病的致病原理也茫然无知,偏信患血吸虫病是因为“风水不好,命不好,祖上没积德”导致“瘟神下界,遭了报应”“神仙也难治好,你们更没有办法”,开展调研工作的血防干部和医护人员更是被戏称为“收屎干部”“验屎医生”^[7]。对血防运动消极对待,严重阻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因此,“经常地、反复地向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就成为开展血防运动的关键。^[8]为此,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下,各地血防部门纷纷成立宣传教育组,通过诸如文字宣传(大字报、黑板报、小册子等)、口头宣传(会议、座谈、广播等)、文艺宣传(地方剧、快板、评

黄勇军,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柳谦,西北师范大学传媒(新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1 陈安禹根据新中国第一部血防电影《防治血吸虫病》改编的同名电影连环画

弹等)等各种形式,在疫区广泛开展宣教活动。但由于当时农民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占绝大多数,对于他们而言,文字宣传“认不到”“看不懂”,口头宣传“讲什么毛蚴、尾蚴,越听越糊涂”,即便利用显微镜进行现场演示也无法理解“对着镜头看得见活蹦乱跳的尾蚴,离开却什么也看不见”的“奇怪”现象,致使他们认为血防工作人员“是在变把戏、演魔术,镜头下看到的怪物是编出来吓唬老百姓的”^[9]。面对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分布广而散的客观实际,特别是偏远山区,传统文艺宣传影响的范围和产生的效果都极为有限。是以,电影作为一种有着“最普遍宣传效果”的“最群众化、有力量的艺术形式”^[10],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向人民群众传播血防知识的重任,成为血防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血吸虫病防治电影”(以下简称血防电影)也由此应运而生。

1950年4月,在较早认识到血吸虫病危害的华东区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崔义田的指示下,主管宣传工作的刘任涛随副部长官乃泉一同赴当时血吸虫病流行最严重地区之一的上海青浦县莲盛公社任屯生产大队(今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莲盛社区任屯村)进行调查,随后创作出新中国第一部血防电影剧本——《防治血吸虫病》,^[11]并于1953年列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的摄制计划,排在卫生方面的第一位。^[12]1954年由郑小秋导演、刘任涛与杉川编剧、裘葛摄影的新中国第一部血防电影《防治血吸虫病》拍竣,并迅速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进行巡回放映,收到“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13],由此开启了新中国血防电影的创作生产历程(图1)。

一、创作生产：政府、人民群众、电影工作者的“三结合”

作为在血吸虫病防治运动中承担知识传播、宣传教育、思想动员等重任、发挥着独特功能的血防电影,各级政府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其创作生产。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指示》,建议“效法东北防治鼠疫办法拟制电影……深入农村扩大宣传”^[14]。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江西省卫生厅将《指示》转发各地,并要求“将血吸虫的生活史及防治方法……制成电影”^[15]。中央有关部门也从各方面积极参与血防电影的创作生产。第一,直接领导和组织拍摄制作。尤以当时成立的血防工作专门办事机构——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时称“九人小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任主任)为代表。据笔者统计,该小组共领导组织拍摄了以血防工作为主题的四部科学教育片、两部情节故事片和两部新闻纪录片^[16],其中包括由“九人小组”副组长魏文伯直接命令上海电影制片厂下设分厂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枯木逢春》以及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送瘟神》^[17]。第二,为保证血防电影能更好地配合血防运动,党委及政府部门还主动指导并参与血防电影的具体创作。如1965年在刚接到《送瘟神》拍摄任务时,导演韩韦认为该片只需说明“血吸虫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各项预防措施”,大体上是“甲乙丙丁各种防治方法的罗列”即可,但根据最后的成片看,上述内容仅占一小部分,该片主要展现的却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血吸虫病”这一“统帅一切”的主题思想。^[18]而出现巨大转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创作团队在创作过程中“党组织曾多次帮助我们了解有关的方针政策,帮助我们在影片中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说明”,由此深刻认识到“科教片在讲述科学技术问题的时候,必须把党的方针政策向群众交待清楚”,必须“突出政治”,因此“根据领导意见,修改了剧本”,使得电影最终由“一本技术手册”转变为“一曲歌颂毛泽东思想胜利的赞歌”。^[19]第三,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大力协助血防电影的创作生

产。由韩韦带领的《送瘟神》摄制组到福建省福清县取景时，血防干部热情拉着他们的手说：“来啦，来帮我们拍电影来啦？什么时候能拍出来？要快点才好啊！”^[20]对血防电影拍摄的支持与渴求溢于言表。当地政府还指派专人负责协助拍摄任务的组织工作，福清县血防站把协助拍摄血防电影作为重点任务来抓，在极短的时间内组成一支有着高度组织纪律、充满干劲和吃苦耐劳的协作队伍，“他们经常提早起来赶到拍摄现场，到了晚上他们便开会检查当天的工作，计划第二天的工作”^[21]，为血防电影能够按时乃至提前完成拍摄提供了积极支撑和重要保障。

血防电影的创作生产除了有政府的领导、指导和支持外，更重要的参与主体还是疫区人民群众，这是由血防电影的“功能性”与“通俗性”决定的。由于血防电影的受众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因此在创作过程中，相较于要求血防电影的“艺术性”而言，让农民“看懂”、令农民“信服”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成为创作血防电影的基本要求。对此，导演韩韦总结出一套经验——电影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从群众的丰富生活中汲取养料”^[22]。人民群众帮助电影工作者完成思想上的“改造”，但这种改造又有别于政府直接领导或指导的方式，是以一种既温和又深入人心的方式促成这种改造，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创作的“养料”，从而保障血防电影在秉承“工具性”的同时具有“通俗性”。也正如导演韩韦所体会的那样，“开始，大家只是从领导的指示中知道这一任务很重要，但对拍这部影片的意义认识是很不足的”，特别是“停留在理性认识上，对血吸虫病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23]而在深入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后，人民群众所遭遇的苦难使他们“深深感到责任重大”，认为应该把“贫下中农兄弟的苦当作自己的苦”，决不能简单地“只抽出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无动于衷地向群众讲述”，更不能将血防电影“拍得像一本技术手册一样”。^[24]同时在具体创作过程中，还必须吸纳“人民的力量”，学习“人民的智慧”，人民群众不仅为血防电影的创作找到了“最好的表现形式”——诸如群众在诉说解放前血吸虫病导致人口只死不生惨景时所用的“整

整七年全村见不到一块尿布”等深刻而形象的表达，也帮助血防电影《送瘟神》写好解说词提供了“生动的群众语言”。^[25]此外，人民群众还以直接参演或间接影响的方式参与到血防电影的创作中来。据《枯木逢春》导演郑君里记述，当地群众会不时向演员倾诉讲解自己解放前后的遭遇，“在这些人物的教育和启示下”“尤嘉扮演的苦妹子形象就逐步丰满扎实起来”。^[26]而在拍摄过程中，也会有当地公社的拖拉机手前来协助拍摄，为电影提供群众演员和道具支持。

尽管血防电影具有极强的“工具性”和“通俗性”，但“艺术性”也必不可少，而如何把握好这三者间的维度，则是电影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从情节故事片《枯木逢春》来看，作为“命题作业”颇具代表性的血防电影，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把毛泽东《送瘟神》诗句抽象化的文字符号进行视听语言的具象化转换和表达。为此，导演郑君里特意从《清明上河图》中学习揣摩有关电影构图和场面调度，运用“横移镜头”将诗的意象巧妙融合在画面中，同时又保持诗韵的一气呵成。^[27]就科学教育片而言，虽然其自身特性决定了不如像情节故事片一样赋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但创作团队也会在血防工作者的协助下，尽量将“枯燥”的血防知识生动地诠释出来，在具有“工具性”和“通俗性”的同时兼具“艺术性”。大量血防科学教育片的基本叙事模式是，首先告诉观众血吸虫病危害的严重性，然后再阐释血吸虫病的来源以及如何防治，最后讲述在政府的领导下血防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在看似千篇一律的叙事逻辑与表现手法下，多数影片却较好地将血吸虫病与人民群众遭遇的困难与面对的挑战紧密勾连在一起，从而让观众产生切身体验并激发真切“共情”“不需要搬用故事片的技巧，而是在科学和生活的规律中，发现了艺术叙述的可能”^[28]。因此，血防科教片这种将科学的解释、艺术的叙述、生活的面貌融合在一起的宣传方法所创造的独特风格样式，被《光明日报》评论员誉为“中国科教片的革命风格所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29]。人民群众也喜闻乐见，称赞“卫生科教影片好，形象宣传记得牢，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男女老少看得懂，群防群治威力高”^[30]。

纵观血防电影在新中国“十七年”间的创作生产，整体上是由政府、人民群众、电影工作者以及血防工作者等集体合作的“结晶”，是“‘三结合’的产物”，是“在血防战线党组织的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血吸

虫病流行地区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由血防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密切协作摄制出来的”^[31]。其中，政府主要以直接领导、主动指导、积极协助的方式参与血防电影的创作，保障了血防电影的“思想性”与“功能性”；人民群众的参与则使血防电影更具“通俗性”；电影工作者则发挥专长，使原本枯燥无味的血防电影在保证“工具性”“通俗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具有“艺术性”。而也正是这三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在十七年间共创作出 20 余部各类优秀的血防电影。笔者根据从各大电影制片厂的出品目录、各省市县的电影志、血防志、卫生志和散乱的报纸期刊报道、放映单位保存的电影完成台本等大量材料中爬梳整理出 1949 年至 1966 年间摄制的部分血防电影，具体见图 2、表 1。



图 2 部分血防电影的剧照、电影完成台本

表 1 1949—1966 年我国摄制的部分血防电影一览表^[32]

时间	片名	类型	创作生产信息
1954	《防治血吸虫病》	科学教育片	导演：郑小秋 编剧：刘任涛、杉川，摄影：裘葛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56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科学教育片	中央文化部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58	《消灭钉螺蛭》	科学教育片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58	《日本血吸虫生活》第一辑	科学研究片	导演：郑小秋，编剧：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血吸虫病研究室 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58	《万户送瘟神》	新闻纪录片	福建电影制片厂
1959	不详	新闻纪录片	珠江电影制片厂 (曾于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孖岗水利工程取景)
1960	《送瘟神》 (又名《在血防战线上》 原名《春风杨柳》)	情节故事片	导演：岑范 编剧：汪自强、周杰，摄影：石凤歧 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
1961	《枯木逢春》	情节故事片	导演：郑君里 编剧：王炼、郑君里，摄影：黄绍芬 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
1961	《在血防战线上》	科学教育片	上海电影制片厂(曾至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取景)
1961	《千军万马送瘟神》	新闻纪录片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
1962	《血吸虫病生活史》	科学教育片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1965	《送瘟神》	科学教育片	编导、摄影：范厚勤，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1965	《送瘟神》	科学教育片	导演：韩韦、殷培龙，编剧：刘咏、韩韦 摄影：阎科德，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
不详	《防治耕牛血吸虫病》	科学教育片	创作者不详 (曾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四川、贵州等地放映)
不详	《送瘟神》	科学教育片	上海电影制片厂 (现存原片，因缺损严重难以辨认)
不详	《血吸虫病防治》	科学教育片	摄影：李振寰

根据表 1 可以看出，1949 年至 1966 年创作生产的血防电影类型主要以科学教育片(包括科学研究片)^[33]为主，新闻纪录片、情节故事片则占少数。这是缘于科学教育片作为“形象化的通俗演讲”^[34]，相较于其他片种而言，能把“枯燥乏味”的血防知识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普及给大众，从而推动血防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创作主体看，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以郑小秋、刘任涛等兼职创作拍摄为主，拍摄制作主要是专业的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20 世纪 60 年代创作主力演变为以韩韦、殷培龙、岑范等主要从事科学教育片创作的专业工作者为核心，生产制作方面除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外，少量的地方电影制片厂以及专门生产故事片的电影制片厂也参与进来。这种创作主体的愈发专业化主要得益于 20 世纪 60 年代政府对科学教育片的高度重视——不仅提出“今后应当把科学教育影片放在和情节故事片、新闻纪录片同等重要的地位”，还要求有计划、有

步骤地建立一定规模的专业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同时鼓励地方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35]由此推动血防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出现创作生产高潮，同时也涌现出诸如《枯木逢春》等艺术水准较高且影响广泛的优秀血防电影代表。

二、发行放映：突出乡村疫区重点与以“专场专映”低价免费为主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就曾摄制过与血防电影相类似的卫生防疫片。如1923年江苏省昆虫局局长吴伟士曾邀请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拍摄“介绍驱灭蚊蝇办法”的《南京驱灭蚊蝇之成绩》^[36]（图3）。20世纪30年代随着“科学教育电影”运动的兴起，卫生防疫片被国民政府提上教育影片计划日程。^[37]1948年寄生虫学家李赋京曾提倡“公演有关日本住血吸虫病的电影”^[38]，但收效皆不尽如人意，其中关键原因就在于血防电影并未在血吸虫病感染的重灾区——农村真正地放映过，亦即血防电影的发行放映环节出现问题。国民政府时期的电影包括血防电影在内的发行放映主要以城市影院为主，即便是放映与防治血吸虫病相关的“土电影”——幻灯片，江苏省苏南地方病防治所却也选在上海大光明、南京大华等城市首轮影院进行，^[39]

广大农民尤其是疫区灾民根本没有机会看到。尽管不乏中国电影教育协会、中国电影制片厂等以流动放映的模式探索农村发行放映路径，但囿于社会环境、技术设备、成本资金等诸多问题^[40]，很难深入农村进行广泛宣传教育，故而血防电影放映传播效果甚微。由此可见，血防电影要想收效良好，关键在于血防电影必须要真正发行放映到疫情严重的乡村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充分注意到电影在城乡放映不均衡的问题，为改变这种局面，1949年10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电影发行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全国发行网”，在同年11月召开的文化部首届行政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必须建立发行放映网，发展放映队深入工农兵”^[41]。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影发行放映网的布局主要以城镇和工矿区为主，但1958年后则重点转向建设“农村电影发行网”^[42]，这为血防电影在乡村疫区的大量发行放映打下了坚实基础。

具体而言，血防电影的发行同其创作生产一样，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政府统一领导和规划中——电影主管部门先从各大电影制片厂统一收购后组织供应，再将血防电影的拷贝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至各省市电影发行公司，地市级的电影发行公司也同样有计划、按比例地逐级向所属区县供应分配，如新中国第一部血防电影《防治血吸虫病》在湖北省疫区的放映正是由省政府下发拷贝片进行的^[43]。

如前所述，血防电影的受众主要是农民，故而血防电影的发行整体上要以农村地区为主，其中又以血吸虫病感染的重灾区为主。为贯彻落实1965年12月湖北省荆州地区卫生局、文化局联合下发的《关于“组织电影血防宣传队”的通知》要求，钟祥县电影放映站配合县委血防办公室按照“突出重点、照顾一般”原则，组织电影放映队先后赴双河、长滩等疫情较严重的地区放映血防电影。^[4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血防电影的拷贝片不在城镇影院发行。根据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宣传科文件及《解放日报》的记载，《枯木逢春》曾于1962年春节在上海市新华、国泰、大光明、大上海、上海音乐厅以及新泾电影



图3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拍摄的卫生实事影片《南京驱灭蚊蝇之成绩》广告



图4 《枯木逢春》电影海报及拷贝胶片

院等地放映^[45]（图4）。但由于城市影院的观众多为城市居民、职工、学生等，在他们看来，血防电影要“有情节、有画面”才值得一看，如果仅是“反映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免不了有农村片老一套的公式，不会有什么新的特点”“听听片名，了解影片内容后，大多数说不想看”。^[46]故而情节故事片类的血防电影一般主要在城市影院发行，而科学教育片、新闻纪录片则主要在农村地区发行。因此，湖北省规定在放映血防电影的类型上要“以科教片《送瘟神》和纪录片《送瘟神》为主，结合放映故事片《枯木逢春》和其他相关影片”^[47]。

在费用方面，电影放映队原则上需向当地发行放映公司支付一定的租片费，但为鼓励电影放映队配合血防运动多放映血防电影，租片费总体上不会过高，甚至实行部分免费。根据一份山西省偏关县电影放映队二队出具的“电影放映队每部影片片租（款）结算单”来看，按放映场地容量的大小或坐席的多少进行计算，该队在1966年8月放映为期近一个月之久的情节故事片《枯木逢春》，片租（款）仅需10元。对于科学教育类的血防电影而言，则相对更低。这是因为科学教育片作为当时血防电影的主要类型，是宣传教育的重点。如果租片费过高，既有悖于国家政策要求^[48]，也不符合乡村地区经济客观现实。如当时就有科教电影工作者提意见认为“目前科学教育片的租费高了些，租映的限制也过严。要从普及科学知识这个政治要求出发，适当放低租映条件和费用”^[49]。既然租片费用低廉甚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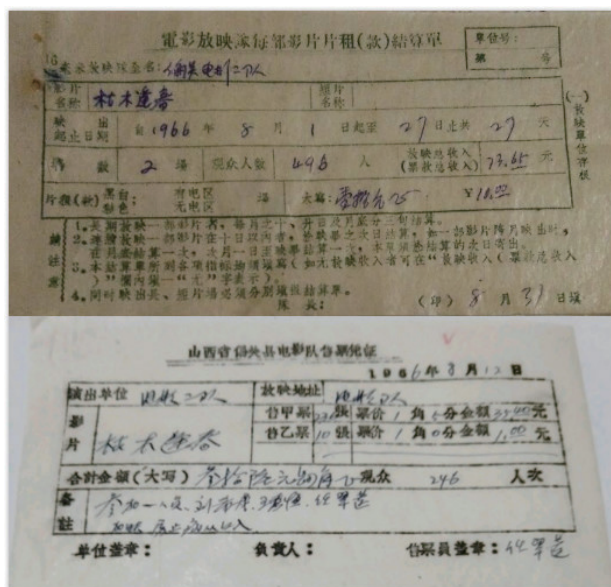


图5 山西省偏关县电影放映队放映《枯木逢春》影片片租（款）结算单（上）、售票凭证（下）

免费，相应地大部分放映收费也必然较低或免费。如湖北省卫生厅、文化局、财政厅联合发文《关于在全省疫区免费放映血防电影的通知》明确规定血防电影“一律实行免费放映，放映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厅另行追加预算”，1965年该省电影公司补贴放映费4700元，为血吸虫病疫区145个大队和四个农场免费放映《送瘟神》《枯木逢春》等367场。^[50]当然，也会有部分地区实行收费放映，如1966年8月12日山西省偏关县流动电影放映队在放映《枯木逢春》时售票，分甲类票一角五分、乙类票一角两种，一天内售出甲类票236张、乙类票10张，共计36.4元。^[51]总体来说，血防电影的片租与票价较低，仅为象征性的收费，这是因为对政府而言重要的是广大农民尤其是疫区群众是否看到血防电影，宣传区域是否广泛，产生的效果是否良好，至于经济上能否有收益，则非主要考虑之因素（图5）。

就血防电影的放映而言，则远比发行要复杂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血防电影虽然以科学教育片为主，但这些影片又与一般意义上诸如《玉米杂交种》《安全使用农药1605和1659》等以推广农业生产技术为主和诸如《战胜小儿百日咳》《防止病从口入》等以普及卫生知识为主的科学教育片不同，血防电影不仅

是农业农村问题，还是农民问题，更是作为“一个阶层的农民的观念习俗、卫生与健康等涉及农民生活水平与文明进程的发展与提高的问题”^[52]，特别是它还肩负着“宣传教育”与“思想动员”等紧迫的“政治任务”。因此，对血防电影的放映就与一般的科学教育片以“映前加映”的方式不同，而主要以“专场专映”的方式进行。据《人民日报》统计，1962年大约有9000支左右的电影放映队在农村为农民巡回放映电影，作为配合血防运动放映的血防电影《枯木逢春》拷贝片达300个以上，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可看到三次。^[53]具体到江苏省苏州市，20世纪50年代放映《血吸虫生活史》400多场(次)，观众40多万人(次)，20世纪60年代放映场次更是大幅增加，仅半年多的时间内就放映《枯木逢春》《送瘟神》等共计850多场(次)，观众近百万人(次)。^[54]

为确保血防电影的宣传效果，血防电影放映队在人员组成上也与一般的放映队不同，除应有的电影放映员外，还配备血防工作人员开展血防宣教工作。如四川省文化局要求放映队需“随省委除害灭病工作组到德阳、绵竹等地放映《枯木逢春》《防治血吸虫病》《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5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电影放映员仅承担电影放映的技术职责，而是还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学习必要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从而成为“既是好的放映员，又是好的宣传员和科学技术普及人员”。^[56]这尤其表现在映前准备工作上。在血防电影放映前，一般会要求电影放映

员结合放映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及危害事例进行宣传，搜集当地的真人真事绘制幻灯片、编写演唱资料、布置挂图实物展览、发放电影说明书、题写宣传标语等，强调进行“活”的宣传教育作为血防电影放映前的预热活动。^[57]除此之外，另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动员群众观影，但一般不由电影放映员具体操作落实，而主要由“各公社、大队血防卫生部门负责组织动员群众”^[58]，以扩大宣传效果，确保尽可能多的群众接受血防教育(图6)。

血防电影的放映受众虽然以农民为主，但在放映过程中也会邀请血防干部及相关工作人员(如医务工作者等)进行观影。据笔者统计，看过血防电影的不仅有中央血吸虫病防治“九人小组”办公室及国家卫生部血防局顾问苏德隆，还有寄生虫学家、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吴征鉴、叶益新、汪钟、单承仕、刘尔翔、柳忠婉、毛守白、郁维等，并在观影后写有相应的“观后感”，这样做一方面扩大了血防电影的影响，同时也使血防工作者真正重视电影对于血防运动的宣传教育作用。如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郁维、中国医学科学院寄生虫病研究所副所长毛守白等人皆肯定了血防电影对血防工作所起的“很大的推动作用”^[59]。苏德隆更进一步认为血防电影不仅是“血防教育”的“好教材”，同时也是“阶级教育”的“好教材”。^[60]当然专家也会从医学专业出发提出批评意见，吴征鉴等人就认为故事片《在血防战线上》“并未着重介绍中医治疗晚期病人腹水的临床效果而强调了动物实验等等，也有些不够确切之处”^[61]。

三、电影宣传：“情感动员”的独特叙事与“映后座谈”的多元诉求

尽管防治血吸虫病属于医学范畴，但它是通过“政治运动”而非“卫生运动”完成的。^[62]这就意味着血防电影不仅是传播防治血吸虫病知识的“工具”，更关键的是要真正成为发动群众开展血防斗争的政治动员的“武器”，而从“工具”到“武器”的转变，正是血防电影宣传必须担负并保证完成的“政治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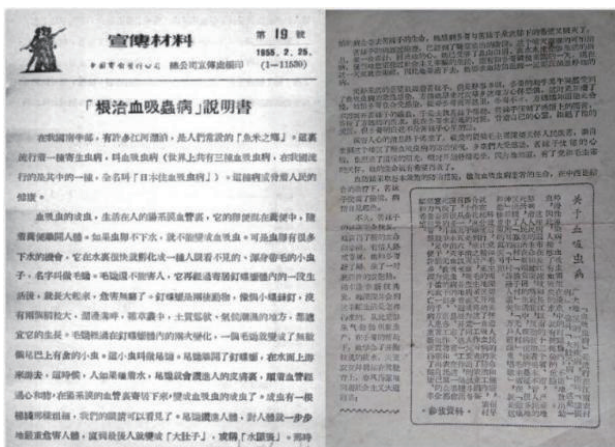


图6 映前宣传材料:《根治血吸虫病》说明书(左)与《枯木逢春》电影宣传单(右)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7 1966年2月，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发行公司等把科教片《送瘟神》送到上海郊区青浦县任屯生产大队放映

与“神圣使命”。因此，血防电影的宣传工作要从“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和国防观点的高度出发”^[63]（图7）。

血防电影无论是科学教育片、新闻纪录片还是情节故事片，其宣传教育内容似乎并无二致，大体上都是介绍血吸虫病的来龙去脉以及总结群众在政府领导下同血吸虫病作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有效方法，因其强烈的工具性、浓郁的专业性以及较多的说教性，导致大多数影片相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接受障碍。但事实上，其传播的效果和产生的作用却非常巨大，这在当时各个层面都有丰富而生动的书写与呈现。如在看完血防电影后，不少群众反映说，“看的是真，听的是真，道理又讲得清，还有什么不相信的”^[64]；下水从不搞防护的“犟劲巴”老农胡七斤“把腿绑起来了”，一贯喝生水的社员李腊芝“不敢再喝了”，喜欢在河里游泳的汪金祥“现在放牛也抹药打绑腿了”^[65]；人民群众开始坚信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给我们治疗血吸虫病，我们一定能送走这个瘟神”^[66]；更有群众深刻地感悟出“只要消灭血吸虫病，才能保障人民健康，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理^[67]。可以看出，血防电影之所以收效良好，关键在于血防电影以其独特的“情感动员”方式把人民群众的心“深深地打动了！”^[68]。对于这种“以情感的模式”进行动员的方式，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认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69]电影史学者李二仕则将其

看作是新中国电影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工具性”这一目的实现的“引导中介”^[70]。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Le Bon, Gustave)认为这种“感情”在群体行为中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感情可以“传染”。^[71]这种群体情感的“诱导”与“传染”经过点状散射与链式传播迅速扩散后，很多地方出现“不少亲人之间相互说服积极投入血防运动”的现象就是充分例证^[72]。以电影为载体进行放映宣传，不仅提高人民群众对于防治血吸虫病的认知有利于推进血防工作的开展，还使更多群众受到深刻的精神洗礼并建立起对新中国的情感认同。当然，血防电影宣传对“情感动员”的成功运用，也基于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对当时多数农民而言仍是一个“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的奇妙幻化、神秘新颖的“洋玩意儿”^[73]，对新鲜事物的惊奇惶恐与本能崇拜使他们“认为凡是给他们看的电影都是好的，电影上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74]。故而血防电影所宣传的内容也得以被人民群众毫无保留地接受并深刻于心，诚如学者所言，“对新政权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人们从亲身参加的种种似懂非懂的新鲜事物中所得到的感受”^[75]。

为进一步加深和强化这种“感受”，在电影放映结束后“组织观众座谈讨论”“进行回忆对比，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76]的“映后座谈”成为重要手段并得到大力推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带有极强目的性的座谈会不仅仅是对血防专业知识的再次讲解与学习，在具体的座谈人员及座谈主题上更是作为明显的“政治思想工作”而进行的。1966年4月4日在江西省余江县平定公社蓝田大队召开的“《送瘟神》映后座谈会”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巧妙的安排”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笔者特细致考辨梳理列表如表2。

从表2可知之所以召开座谈会，是缘于当地群众在看完血防电影《送瘟神》后意犹未尽心中有许多话想要对“党和毛主席”倾诉，因此在这种“群众情绪异常激动的氛围中……开了这个座谈会”^[77]，也即“映后座谈”的召开是人民群众的主动选择，而非被动要求。对于“何人参会”的问题，并非随机安排，而是

表2 《送瘟神》映后座谈情况简表^[78]

座谈时间	1966年4月4日
座谈地点	江西省余江县平定公社蓝田大队(今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平定乡蓝田村)
座谈影片	科学教育片《送瘟神》
座谈动机	“放映完了,他们还迟迟不愿离去,心中有许多话要对党和毛主席说”
主持人	刘金元(大队党支部书记)
座谈人员	刘金元(大队党支部书记,曾患晚期血吸虫病) 姜季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省劳动模范,兼任张家滩生产队队长,曾患晚期血吸虫病) 蔡港华(大队查螺员,曾患晚期血吸虫病) 邓禾标(大队社员,下中农,全家五人除母亲外皆患晚期血吸虫病,弟弟、父亲不治身亡) 姜发莲(大队社员,佃中农,两个兄弟、丈夫皆患血吸虫病不治身亡)
发言主题	刘金元、邓禾标、姜发莲:“旧社会,两种瘟神害人民” 刘金元、邓禾标:“新社会,送走瘟神为人民” 姜季万:“送走瘟神,生产大发展” 蔡港华:“视螺如敌,提高警惕”

有着周密的考虑。首先,参会的主体人员须与“血吸虫病”相关,甚至曾患过血吸虫病的他们都在解放后被“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治好了。其次,参会者具有特定的代表性,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党支部书记刘金元等为代表的“公家”人员,主要充当座谈会的主导者;第二类是普通社员代表,如邓禾标、姜发莲等,是座谈会的主要发言人;第三类是代表大队工作重心的生产组长或血防工作人员,如姜季万、蔡港华等。^[79]由此既保证人员搭配上具有均衡性、普遍性和代表性,同时也确保各代表所承担的座谈任务与发言内容既各有侧重分工,又相互补充印证。

由于座谈会的主体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看电影机会少,绝不可能要求像知识分子那样夸夸其谈”^[80],因此主持人必须要发挥好引导和启发的作用。根据《江西日报》1966年4月14日刊载的具体发言记录梳理,大致遵循如下逻辑关系:

刘金元发言(《送瘟神》展现了解放前蓝田坂景象,尤其是邓姓家族灭绝得只剩邓禾标一家)→邓禾标发言(解放前饱受血吸虫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折磨)→刘金元插话(国民党反动派和血吸虫病瘟神一样可恨!)→姜发莲发言(现在享的是政府的福)→刘金元发言(要不是政府派来医生,骨头早烂了)→大家纷纷回应,同声赞扬→邓禾标发言(政府如何关心包括血吸虫病病人在内的人民群众)→刘金元插话(要感谢政府,把生产搞上去,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姜季万发言(现在粮食高产要不忘政府的

恩)→蔡港华发言(要提高警惕,做好查螺防病工作)→刘金元插话(蓝田坂已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目前就怕麻痹思想)→在座的社员都表示要向《送瘟神》学习,永远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从刘金元的发言可以看出,其先是从放映的血防电影故事内容入手,重温《送瘟神》电影情节,然后引导参会人员再次勾起对解放前悲惨遭遇的回忆,从而很自然地转到座谈会核心主题叙事。在发言过程中,刘金元共插话三次,而这三次都很好地引出了与之相衔接的发言主题。

第一次是引出对旧社会的仇恨从而激发对新政府的感恩,第二次是阐述新政府是如何帮助农民赶走国民党反动派和血吸虫“两大瘟神”,第三次是启发如何将感恩之情转化为革命生产,由此形成了“控诉→感恩→奋斗”的严谨逻辑关系。对于普通社员而言,他们都是深受血吸虫病戕害的代表,由此可有效地将血防电影与实际联系起来,在既教育自己的同时也教育他人,但这并非互相批评,更不是自我检讨,而是一种围绕中心主题的情感控诉与抒发。同时,将具有相似经历的观影者聚在一起进行情绪宣泄的基础之上凝聚共同的情感体验,从而把“个体情感”转变为“集体情感”,诱发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所谓的“集体兴奋”,“而后它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感(特别是道德团结,有时是诸如愤怒这类攻击性的情感)”^[81]。比如姜发莲在控诉完解放以前悲惨的遭遇后,“看到电影的毛主席,我眼泪就忍不住了。我心里想:毛主席呀,我现在享的是你的福气,生活过得很好”,此时座谈会气氛马上由对旧社会的怨恨控诉转变为“大家一个个面带笑容,同声赞扬新社会,歌颂毛主席”。而对于主管生产的姜季万以及查螺员蔡港华而言,他们与普通社员主要担负倾诉职能不一样,还需配合大队的中心工作任务。比如姜季万随着主持人的引导将当前粮食高产解说为是报政府的恩,蔡港华也同样在反思自己血防工作的同时引导教育别人——政府为我们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我们还能让血吸虫病再来缠身?”^[82]

血防电影映后召开的座谈会并非严肃、紧张的正式座谈，同时又迥异于发言批评的形式。尽管这种形式看似“自发”，实则是政府精心组织下的蕴藏国家认同、阶级斗争、群众发动、农业生产、国防教育、卫生防护、乡村建设等多重目标的“多元诉求”。因此相关部门不仅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放映完血防电影后必须举行“映后座谈”，还须将“放映宣传效果等情况”及时上报。^[83]同时，政府对“映后座谈”的具体组织与运作进行规范，如1965年广东省吴川县编写的《怎样组织映后座谈》材料就明确规定“怎样组织”“邀请什么人参加，什么时候座谈合适”“谈什么、怎样谈”等。^[84]这样规范化、系统化的“映后座谈”使得宣传效应要远比纯粹的“病人诉苦会”好得多，“不仅使当地群众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提高了防治血吸虫病的信心”，同时也进一步让群众“体会到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不少社员都表示要用实际行动投入‘血防’工作，搞好生产，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关怀”。^[85]

结语

血防电影作为应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运动需要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电影形态，是在政府、人民群众、电影工作者以及血防医务人员等的通力合作下创作的，是血防科学教育片、血防科学研究片、血防情节故事片以及血防新闻纪录片等的总称。血防电影通过独特

的发行放映机制及广泛的宣传教育，不仅使人民群众获得科学的血防知识，转变对血防运动的态度，从初期的普遍抵抗与排斥转而逐渐接受并积极配合，还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民群众对国家与民族的高度认同，最终使血防运动成为“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群众卫生防疫实践之一。^[86]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血吸虫病在我国得以有效防治，血吸虫病在许多地区已基本消失，尽管血防电影在20世纪80、90年代仍有部分摄制并产生一定影响^[87]，但其不复往昔兴盛逐渐走向式微却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血防电影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的知识传播、宣传教育、思想动员等特殊价值与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视与磨灭的。尤其是面对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不停反复的难题，又促使我们从中寻找历史的延续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在疫情大考的当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精神，“营造万众一心阻击疫情的舆论氛围，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88]，正是包括广大电影工作者在内的全民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注：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现代电影小说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905—1949)”(项目编号：20XZW021)、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翻译通史”(项目编号：20&ZD313)、2020年西北师范大学科研资助项目“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研究(1949—1966)”(项目编号：2020KYZZ00108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龙力莉)

注释：

[1] “‘送瘟神’的有力助手”是上海市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郁维对血吸虫病防治电影的评价。见：郁维·“送瘟神”的有力助手 [N]·文汇报，1966-02-22(2)·

[2] 王小军·血吸虫病与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变迁(1905—1978

年)[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1·

[3] 施有铨·毛主席与“送瘟神”[N]·浙江老年报，2007-12-21(03)·

[4] 周恩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 [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18)：327·

- [5] 崔义田·大力开展华东农村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N]·解放日报, 1951-11-09(03)·
- [6] 又称“送瘟神”运动,为统一表述及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血防运动”。
- [7] 参见:中共江西省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余江县是怎样根除血吸虫病的[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8:20;唐铮·“送瘟神”——“血防”:新中国第一场疫控战争[J]·山东卫生,2008(5):62·
- [8] 周恩来·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7(18):331·
- [9] 李正兰口述,宁海生整理·我参加血防科普工作[A]·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印·江西文史资料(第43辑)送瘟神纪实[Z]·1992:132-133·
- [10] 参见: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1949年8月14日)[B]·转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1949年1月至9月)[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420;中共中央对中央文化部党组《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批示(1954年1月8日)[B]·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6·
- [11] 刘任涛·你还活在我的心中——缅怀怀乃泉同志[A]·胡田成编·忆怀乃泉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19·
- [12] 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今年将摄制和翻译许多部科学教育影片[N]·人民日报,1954-04-16(3)·
- [13] 刘任涛·刀与笔——回忆我的影剧生活[A]·黄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梅文史资料(第3辑)[Z]·1989:92·
- [14] 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指示[B]·转引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编印·文教政策汇编(第一辑)[Z]·1950:141·该《指示》中提及的“电影”即指1948年由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科学教育片《预防鼠疫》。
- [15] 江西省余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余江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583·
- [16] 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防治血吸虫病三十年[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3·
- [17] 参见:王炼·《枯木逢春》从话剧到电影[A]·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口述上海:电影往事(上)[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81;邹华义·“一定要消灭吸血虫病”!——记毛主席两次在杭州[A]·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杭州文史资料(第17辑)[Z]·1993:5-6·
- [18] 参见笔者收藏《送瘟神》(1965年12月版)电影完成台本以及韩韦、殷培龙撰写的《拍摄〈送瘟神〉的几点体会》。
- [19] 韩韦,殷培龙·拍摄《送瘟神》的几点体会[J]·电影艺术,1966(3):32-33·
- [20] 韩韦·拿起电影武器投入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科教片《送瘟神》拍摄散记[N]·文汇报,1966-02-22(2)·
- [21] 韩韦·拿起电影武器投入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科教片《送瘟神》拍摄散记[N]·文汇报,1966-02-22(2)·
- [22] 韩韦·群众教我们拍《送瘟神》[N]·解放日报,1966-03-20(4)·
- [23] 韩韦·拿起电影武器投入防治血吸虫病的斗争——科教片《送瘟神》拍摄散记[N]·文汇报,1966-02-22(2)·
- [24] 韩韦,殷培龙·拍摄《送瘟神》的几点体会[J]·电影艺术,1966(3):32·
- [25] 韩韦·群众教我们拍《送瘟神》[N]·解放日报,1966-03-20(4)·
- [26] 何其烈,陆左华·学工农兵 演工农兵[N]·人民日报,1960-12-31(7)·
- [27] 郑君里·温故而知新[N]·人民日报,1962-04-11(5)·
- [28] 方明·科学·艺术·生活——谈科学教育片[N]·光明日报,1954-01-10(3)·
- [29] 歌颂防治血吸虫病的伟大胜利,科教片《送瘟神》获得较高成就[N]·光明日报,1966-03-26(2)·
- [30] 百色地区卫生防疫站组织放映队深入农村开展卫生宣传[J]·广西卫生,1975(6):18·
- [31] 韩韦,殷培龙·拍摄《送瘟神》的几点体会[J]·电影艺术,1966(3):32·
- [32] 囿于篇幅所限,该简表的参考资料不一列出,表中所列血防电影仅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同时因史料欠缺,年代、片名、创作者等详细信息仍不免多有缺漏,皆以“不详”处理,待后再证。
- [33] 在许南明等主编的《电影艺术词典》中,认为科学研究片属于科学教育片的一种样式,本文沿用此说法。参见:许南明、富澜、崔君衍主编·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75·
- [34] 看科教片用科教片[N]·解放日报,1966-03-20(1)·
- [35] 参见:中央文化部召开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J]·电影艺术,1960(3):88;季中华·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J]·科学通报,1965(6):558-559·
- [36] 据笔者考证,该片即被当前学者以讹传讹的《驱灭蚊蝇》一片,恐贻误后者,特在此更正片名为《南京驱灭蚊蝇之成绩》。参见:商务新出卫生事实影片[N]·申报,1923-08-05(18)·
- [37] 潘澄侯·教部近数年来办理中国教育电影概况(二)[N]·申报,1939-04-18(007)·
- [38] 李赋京·中国之日本住血吸虫病及其管制[J]·中华医学杂志,1948,34(9):422·
- [39] 武进县日本住血吸虫病调查报告书(1948年5月)[B]·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号:1010-002-0116·
- [40] 相关研究参见:李华·浅析国民党官营电影与抗战宣传[J]·当代电影,2018(3);郭洋·电影与抗战动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影放映队的实践[J]·民国研究,2019(2)·
- [41] 文化部电影局首届行政会议,决定今年影片生产计划,坚定地继续贯彻工农兵方向[N]·人民日报,1950-01-17(3)·
- [42] 积极发展电影放映网[N]·光明日报,1959-12-23(1)·
- [43] 周陵生主编·湖北血防[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94·
- [44] 钟祥县文化局编印·钟祥县文化志·电影[Z]·1985:51·
- [45] 姜进主编·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1907—1966(第4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5:719;《枯木逢春》电影春节上映情况调查[B]·转引自李镇主编·郑君里全集(第7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344·
- [46] 《枯木逢春》电影春节上映情况调查[B]·转引自李镇主编·郑君里全集(第7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6:344-345·
- [47] 关于在全省疫区免费放映血防电影的通知[B]·湖北省档案馆,档案号:SZ115-02-0809·
- [48] 中影公司总经理杨少任在1958年认为电影发行放映网“应以发行、放映新闻纪录、科教影片为主”。而事实上,学者柳迪

- 善也印证了在 1949 至 1966 年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确实是以“纪录片、科教片”为纲。参见：杨少任·工作随笔三则 [J]·电影放映 [J]·1958(12):3; 柳迪善·十七年时期电影在农村的考察 [J]·电影艺术, 2013(3): 115.
- [49] 科学教育影片的生产发行工作 [N]·光明日报, 1956-08-02(02).
- [50] 参见：湖北省阳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阳新县志 [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3: 749; 关于在全省疫区免费放映血防电影片的通知 [B]·湖北省档案馆, 档案号: SZ115-02-0809.
- [51] 参见图 5 “山西省偏关县电影放映队放映《枯木逢春》影片片租(款)结算单(上)、售票凭证(下)” (笔者藏)。
- [52] 刘广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电影放映研究 [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173.
- [53] 九千个电影放映队活跃在农村 [N]·人民日报, 1962-12-14(2).
- [54] 参见：苏州血防史志编纂委员会·苏州血防史志 [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41; 周家瑜主编·血防之窗——苏州血防案例纪实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72.
- [55]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史志组编印·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志资料汇编(第 4 辑) [Z]·1990: 36-37.
- [56] 季中华·全国科学教育电影工作会议 [J]·科学通报, 1965(6): 559.
- [57] 《送瘟神》在市郊上映 [N]·文汇报, 1966-02-22(2).
- [58] 周家瑜主编·血防之窗——苏州血防案例纪实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72.
- [59] 参见：郁维·送瘟神的有力助手 [N]·文汇报, 1966-02-22(2); 毛守白·《送瘟神》是为农民服务的优秀科教片 [N]·文汇报, 1966-02-22(2).
- [60] 苏德隆·阶级教育和血防教育的好教材——影片《送瘟神》观后感 [N]·解放军报, 1966-03-20(4).
- [61] 吴征鉴, 叶益新, 汪钟, 单承仕·“春风杨柳万千条”——《在血防战线上》观后感 [J]·大众电影, 1960(15): 19.
- [62] Miriam Gross, *Chasing snails: Anti-schistosomiasis campaig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San Diego: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0: 76.
- [63] 关于在全省疫区免费放映血防电影片的通知 [B]·湖北省档案馆, 档案号: SZ115-02-0809.
- [64] 中共湖南省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湖南省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材料汇编 [Z]·1958: 117.
- [65] 为孝感、江陵、枝江 3 县血吸虫病疫区社教运动提供的材料和建议 [B]·湖北省档案馆, 档案号: SZ115-04-0017.
- [66] 枯木逢春 [A]·胡学林编著·宜昌市猗亭区政协文史资料(第 3 辑) [Z]·宜昌: 宜昌猗亭区政协文史委员会印, 2016: 235.
- [67] 周家瑜主编·血防之窗——苏州血防案例纪实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72.
- [68] 斗倒瘟神唱赞歌 齐声呼唤毛主席——青浦县任屯村民畅谈《送瘟神》 [N]·解放日报, 1966-03-20(4).
- [69] Elizabeth J. Perry,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J]·*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2, 7(2): 111-128.
- [70] 李二仕·十七年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 [A]·陆弘石主编·中国电影：描述与阐释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 330.
- [71] G.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M]·GA: Cherokee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 [72] 周家瑜主编·血防之窗——苏州血防案例纪实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 172.
- [73] 观美国影戏记 [N]·游戏报, 1897-09-05(74).
- [74] 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5: 78.
- [75] (美)麦克法夸尔著·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下卷(1966—1982)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82. 转引自刘宇·国家话语下的宣教与娱乐——以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为个案(1949—1953) [J]·中共党史研究, 2014(8): 121.
- [76] 看科教片用科教片 [N]·解放日报, 1966-03-20(1).
- [77] 该表主要来源于《江西日报》1966年4月14日刊载的报道《看电影, 忆当年, 齐声呼唤毛主席——余江县蓝田大队社员畅谈影片《送瘟神》》, 部分源自江西省余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余江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刘玉瑞等主编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送瘟神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2年)等资料。
- [78] 看电影, 忆当年, 齐声呼唤毛主席——余江县蓝田大队社员畅谈影片《送瘟神》 [N]·江西日报, 1966-04-14(3).
- [79] 需要指出的是, 笔者搜集到的另一则史料——1966年2月5日在上海市郊区青浦县莲盛公社任屯大队召开的科教片《送瘟神》“映后座谈会”中, 参会人员也同样可分为上述三类, 但囿于字数所限及本文探讨的重点, 不再展开论证。
- [80] 广东吴川县电影管理站·怎样组织映后座谈 [J]·电影放映, 1965(3): 6.
- [81] (美)兰德尔·柯林斯著·林聚仁等译·互动仪式链 [M]·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9: 157.
- [82] 看电影, 忆当年, 齐声呼唤毛主席——余江县蓝田大队社员畅谈影片《送瘟神》 [N]·江西日报, 1966-04-14(3).
- [83] 参见笔者收藏中共如东县委宣传部文件“关于组织放映‘送瘟神’电影的通知”。
- [84] 广东吴川县电影管理站·怎样组织映后座谈 [J]·电影放映, 1965(3): 6-8.
- [85] 四川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广大劳动人民喜爱科学教育电影 [J]·电影艺术, 1965(2): 10-11.
- [86] 易莲媛·“送瘟神”与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J]·读书, 2020(10): 3-4.
- [87] 如 1985 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科教片《防治血吸虫病》, 该片曾获得 1986 年 12 月全国卫生电影电视片“白鹤奖”三等奖, 1993 年湖南省健康教育所摄制卫生科普片《血吸虫病防治》曾获卫生部、全国爱卫办、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 6 部委“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杯”三等奖。
- [88] 欧阳辉·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 [N]·人民日报, 2020-02-18(9).